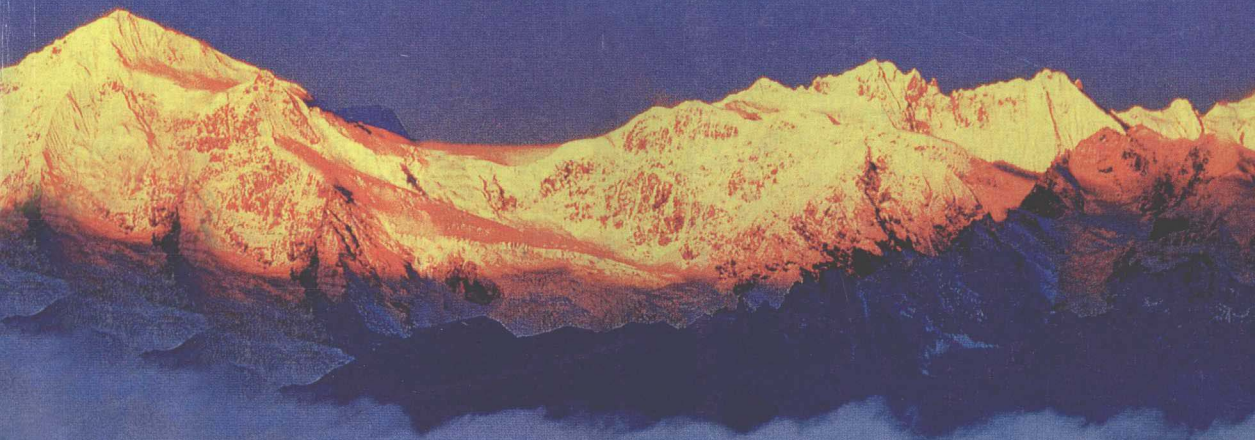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文丛·重大项目

中国新文学家与现代文化建设

下卷

吴义勤 主编



山东教育出版社

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

中国新文学史与现代文化建设

丁守和

（北京）

（北京）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文丛·重大项目

中国新文学家与现代文化建设

下卷

吴义勤 主编



山东教育出版社

中国新文学家与现代文化建设

吴义勤 主编

主 管：山东出版集团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济南市纬一路 321 号 邮编：250001)
电 话：(0531)82092663 传真：(0531)82092661
网 址：<http://www.sjs.com.cn>
发 行 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印 刷：山东新华印刷厂
版 次：2009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2000
规 格：787mm×1092mm 16 开本
印 张：65.25 印张
字 数：1252 千字
书 号：ISBN 978—7—5328—6241—2
定 价：150.00 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 新海派与新文化——王安忆与现代文化建设/马春花 /665**
- 一、身份确证与文化认同 /666
 - 二、性别政治与文化地理 /673
 - 三、文学镜像与上海文化 /703
- 大众表述与文化认同——池莉与现代文化建设/孙桂荣 /740**
- 一、池莉:大众视阈下的文学神话 /740
 - 二、“大众化”文学观的确立 /748
 - 三、大众诉求的文化表达方式 /759
 - 四、池莉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大众化” /779
 - 五、文化认同的可能性及其争议 /789
 - 结 语 为池莉辩护:以“大众”的名义? /811
- 转型时代的文化与文学图景——张洁与现代文化建设/周志雄 /815**
- 一、张洁:一个当代文化转型的标本 /815
 - 二、极端的女性:张洁与女性文化思潮 /820
 - 三、撕裂了再拼接:现代主义文化思潮语境中的张洁小说 /838
- 文学与文化版图的塑型师——韩少功与现代文化建设/李 莉 /856**
- 一、文化整合:文化人格的构建 /856
 - 二、文化挖掘:民间文化的书写 /874
 - 三、文化表达:语言文化的张扬 /885
 - 四、文化创新:文体文化的探索 /902
 - 五、文化扬弃:文化传承与批判 /921
- 文化的杂色与狂欢——莫言与现代文化建设/王金胜 /935**
- 一、“民间”的寓言:现代性文化语境中的莫言小说 /935
 - 二、民间文化与莫言小说的传奇性 /948
 - 三、民间文化与莫言小说的生命精神 /959

- 四、民间文化与莫言小说的狂欢化色彩 /969
- 文化悖论与文学创新——王小波与现代文化建设/房 伟 /980**
- 一、思想型作家：现代化语境中的王小波及其创作 /980
- 二、现代性的另一种反拨：性爱 智慧 自由 反乌托邦 /982
- 三、文化悖论：现代文化建设的历史与现实语境 /984
- 四、从神圣话语圈到边缘化叙事：一个自由主义者的精神成长史 /988
- 五、“宽容新理性”：王小波的文化逻辑 /993
- 六、想象性、自由视角、多重时空——建立在悖论美学之上的游戏精神 /1000
- 七、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重塑：王小波及其写作意义 /1013
- 后 记 /1023

新海派与新文化

——王安忆与现代文化建设

马春花

古人谈小说,以为是流言之类,“小说”而已。小说变大,仰仗现代启蒙,革命从话语开始,小说亦在其中。小说革命之后,肩负民族之思、现代之想,是一个现代性想象的世界,《狂人日记》以小说作大说,只能做民族寓言看,不可当街谈巷议观。及至革命文学、工农兵文学,也是阶级的影射、大同的遐想,大说变成大话,成了阶级图解的工具。新时期文学从伤痕起家,反思、寻根一路下来,还是小说当大说,人性、主体之类,以个人主义成全家国想象,是“五四”理路的一脉相承。在此“大说”的时代,王安忆忝列其中,固然《小傢伙》、《小鲍庄》、《小城之恋》一味说小,谁知《小鲍庄》便是个中国寓言,乡土中国,堂皇千年,《小鲍庄》数言道破,小说“大说”,莫过于此。“三恋”虽小,尽是男女之事,然而切合时代走向,欲望物质化,是世俗现代性的要求,“三恋”爱情障眼,却是用弗洛伊德过渡,彼岸是一个感官王国。现代未落,后现代蜂起,“后89”是个“小说”的时代,众声喧哗,莫衷一是。王安忆数落《叔叔的故事》,借以告别乌托邦,回溯《好婆和李同志》,开始上海怀旧,《纪实与虚构》、《长恨歌》、《富萍》、《桃之夭夭》等,勾勒了上海的前世今生、人文地景,历史风尘之下是流言的细节,动辄鸿篇巨制则包含巨大野心,竟是为上海画像、国族写史的心思。此样宏大叙事,应是革命时代的遗传,人称“共和国的女儿”,确是缘来有自,而非空穴来风。于是《长恨歌》的怀旧之中,是若隐若现的社会主义乡愁,而《遍地英雄》里,则是浪漫主义的革命遐思,遍地枭雄的长恨歌,或者就是后革命时代的小说中国。

比之历史,小说更近人心。饮食男女虽然平常,却是生活的芯子,小说都以此打底,讲的多是风流韵事、日常传奇,便是攻城略地的浩然历史,其实也是小说的大而化之,逐鹿中街就是逐鹿中原。自1990年代之后,王安忆小说尤重细节,笔墨所及,纤毫毕露,历史风起云涌,却做了日用常行的背景,无论如何异样吊诡,一颗平常心总是不变。所谓平常心,在王安忆而言,就是自由和秩序,是中产者的价值观,小说中的性别地理、上海地景皆是源来于此,体现了一个阶级的空间政治。自由是消极

的自由,秩序是去政治化的纵容,革命是美学的游戏,解放来自于快感。沉迷于奢靡的细节,就是典型的布尔乔亚风格,王安忆的细节拜物教并不突兀,是一个阶层格调的显示。“后 89”的中国,改革急进,市场日新,消费主义甚嚣尘上,新主流秩序,极力营造中产阶层的形象,消费主体、经济主体、政治主体以及文化主体,是这个阶层的形象内涵,而白领、私营业主、政府官员则是这个阶层的形象代表,一个市民阶层呼之欲出。阶层文化塑造也是打造新主流秩序的内容之一,上海怀旧就是追溯流逝的布尔乔亚年华,王安忆的小说也不脱于这个诉求,致力于营造一种中产阶级的小说美学,这个追求符合王安忆的身份认同,革命之子就是革命时代的中上阶层,想来不会有什么疑义。王安忆的上海怀旧,无论是革命时代的,还是前革命时代的,其实都是“后 89”时代的集体无意识,市场经济的自由主义在制造了一个阶层幻觉的同时,也制造了关于这个阶层的美学。王安忆的小说或者是个寓言,也不曾与当下中国背道而驰,倒是相映成趣,互为镜像。

一、身份确证与文化认同

王安忆是一个勤奋而多产的作家,也是一个不停前行的作家,她总在变,变得让评论者、特别是那些追踪研究的评论者无法对其加以归纳总结。在《论王安忆》中,汪政、晓华在回顾了她的小说艺术之路,把她的创作分成六个阶段后这样说:“我们深深感到,对王安忆这样的作家,要对其二十年的创作进行总体性的评论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她的变化实在太大了。”^①其实,早在 80 年代后期,评论者已经有这样的感觉了,那时程德培就说:“由于她富于变化的多产,致使对其创作的描述与概括,多免不了马不停蹄式的浮光掠影。”^②对王安忆的变化,评论者其实是已经达成了共识。这也难怪,创作 30 年,从起点到现在,你几乎认不出原来那个她了。初涉文坛,她写了好多关于儿童的故事,也发表在儿童文学的杂志上,被看成是儿童文学作家不算无凭无据。然后,她写一个类似她的女孩子“雯雯”,甚至形成一个系列,从 80 年代延续到 90 年代后期,《一个少女的烦恼》、《雨,沙沙沙》、《六九届初中生》、《忧伤年代》等都是。可是很快她由自己走向他人,写了《庸常之辈》、《本次列车终点》、《墙基》、《尾声》、《舞台小世界》等,有人又把她称为知青文学作家。但是不久,她又回到写“雯雯”系列时所用的那种对主观情绪的渲染上,写“三恋”,写《岗上的世纪》,被人称为写“性”的作家。之后,她不写城市,而写农村,写传统文化,这有了《小鲍庄》、《大刘庄》等,她又成了寻根文学作家。再之后,她写《弟兄们》、《逐鹿中街》、《叔叔的故事》,或者叙写女子情谊的生成与破裂,或者演绎性

① 汪政、晓华:《论王安忆》,《钟山》2000 年第 4 期。

② 程德培:《面对“自己”的角逐》,《当代作家评论》1987 年第 2 期。

别间的硝烟,或者解构男性知识分子的启蒙神话,她又被当仁不让地认作是女性主义作家。《纪实与虚构》、《伤心太平洋》,或虚构母系家族神话,或虚构父系家族神话,她似乎又跟了一次家族小说的风。《香港的情与爱》、《长恨歌》,她又以情与爱来为城市造像,既有点新历史小说的味道,也有点新市民小说的意思,但是又都说不上。90年代中期以后,王安忆的小说创作数量依然颇丰,短篇、中篇、长篇都有,写城市,也写乡村,写女人的故事,也写男人的情义,杂沓纷至,让人应接不暇,眼花缭乱。因此,要在整体上写王安忆几乎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哪一个文学思潮好像都有她,但是哪一个思潮也不能完全诠释她。说她是边缘与另类,连评论者自己都不相信,王安忆怎么会是另类呢,她是永远的主流中人,却总是在主流之内闪移腾挪。于是,我们也只能用变化来指认她,而且有时还得这样说:“从总体上看,这种变化甚至是戏剧性的。”^①那么,从哪个方面入手来看王安忆的小说才能真正挖掘其文化内涵呢?我想引入“身份”这个术语,从王安忆的身份政治来看王安忆的小说,看她身份的确立与小说面貌之间的关系,看她小说呈现不同面貌的内在动因,这样王安忆的小说就会真正像她说的是“随着自己的成长而逐渐成熟”。

(一) 国族想象与身份认同

关于身份的学术研究来自不同的研究领域,从心理学、社会学及其他社会科学到文学与文化理论。自从身份这一术语成为公共话语的40多年来,它被赋予了各种各样的意义。在艾里克森的模型中,身份发展指的是个性的发展,是一种个人所处的社会背景之中关于自我的固定的核心意识,即回答和解决“我是谁”这一问题,而与此相关的问题族群主要由以下一些互有联系的问题组成,如我曾经是谁?我想成为谁?我的自我认同我的身份是否会获得人们的承认?人们将我指认为谁?等等。身份的发展过程是通过发展的每一阶段的一系列特殊任务来完成的。其中,青少年时期是身份形成的关键时期。此时,他试图整合自己青少年时期的认同经验与社会对他的期待,来建立自己的社会身份以获得自己存在的证明。王安忆早期的儿童题材的小说,其实是青年时期的王安忆对童年经验的缅怀和整理,是她开始思考自身存在试图确立自己身份的前奏。果不其然,很快,王安忆就开始了真正的对自己身份的寻找。身份通常是多重的,或者是由无数的方式组成的,比如性倾向、种族、阶级、民族、性别、年龄、能力等等,它们可以是相互交叉或相互结合的。但正如艾里克森所言,身份的发展过程是通过每一阶段的一系列特殊的任务来完成的,在个人生命不同发展阶段里,身份的认同与发展也会表现出不同的面貌。

对年轻的王安忆来说,对身份最初的寻找首先是对自身的社会阶级/阶层身份的寻找和确证。虽然对“我是谁”的回答可能也会遇到性别身份问题,但在王安忆成长的六七十年代,性别还是个隐蔽的问题,年轻的王安忆对性别身份的确证是不

^① 周新民、王安忆:《好的故事本身就是好的形式——王安忆访谈》,《小说评论》2003年第3期。

自知的。不过,对自身阶层的身份的寻找却是显在的。几乎在伴随写雯雯系列的同时,对自身社会阶层身份寻找、焦虑和确证的过程就已经开始了,但真正显现却是在《纪实与虚构》中。

《纪实与虚构》是一个城市人的自我寻找和追溯,它回答的是这样一个问题:谁家的孩子怎么长成?即“她这个人是怎么来到世上,又与周围事物处于什么样的关系”。为什么她会提出这种问题呢?因为她在上海无根,是个外来者。她随着革命家庭进驻城市,作为“同志”的后代,革命之子,在新中国的上海,分享着主流政治话语给她带来的荣耀,但是那个旧上海却依然鲜活地存在,以日常生活的一日三餐、以上坟祭祖的仪式,存活于民间形态中。这个民间的旧上海,对革命之子来说,是上海的芯子,散发着蛊惑的魅力,她想成为一个真正的上海人,她就需要向这个上海靠拢,向这个身份靠拢。但是,作为革命者的母亲却力图隐藏与这个城市的血缘关系,只与同志往来,不承认这个城市里还有什么亲戚。“亲戚算什么?过年的时候我奶奶带我到姨母家去,我在楼下磕三个响头,上面就扔下一块钱,这就是亲戚。”对母亲来说,旧上海与她心中的伤痛连在一起,她是个“孤儿”,革命是她的出路和新生。母亲对亲戚、血缘的否定与抛弃其实就是对民间形态的上海的否定与抛弃,让“我”无法去靠拢那个自己想拥有的身份,这样,在她自己设想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与别人(母亲)把自己看成并希望变成什么人之间,出现了断裂和认同危机,这使“我”的生命感到压抑、自卑和孤独。但是这种感情却并不能阻碍“我”对家族神话、对血缘等民间形态的迷恋和追索,从母亲一支,王安忆开始虚构母系家族神话,金戈铁马,英雄伟业,最后却只是烟雨楼台。虚构母系家族神话也好,纪实自己的成长也罢,都像王安忆所说是创造世界的一种方法,更是确立自己身份的一种努力。但是,最终,母亲的力量是强大的,母亲背后有着强大的家族神话,王安忆对民间形态的上海身份的渴望终将悬置。她只能是革命之子,一个旁观者,一个占领者,她的身上流淌着有着强烈的孤儿习气的革命者母亲的血液,也流淌着有着强烈的浪荡子习气的革命者父亲的血液(《伤心太平洋》讲述的是父系家族神话,也是一个关于革命者的家族讲述)。因此,王安忆的写作只能是革命之子对市民确切地说是中产阶级的市民的上海的旁观,不无羡慕,也不无嘲讽。

(二) 阶级意识与“共和国之子”的弄堂生涯

《墙基》是王安忆1981年发表在《钟山》的一篇小说。小说写了两条弄堂,“这一条弄堂里住的都是些高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另一条弄堂里面住的都是城市贫民、工人家庭。”“这是两个阶层,两个世界,中间隔着好厚的一堵墙。”^①墙基是个象征物,凸现了阶级/阶层的隔绝。历史机缘使得沟通首先在两个孩子之间达成,继而波及两弄居民。但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沟通又被隔绝所替代,一切都恢复

^① 王安忆:《感受·理解·表达》,《上海文学》1982年第8期。

到了以前，墙基“还在，横着，高出地面一二厘米，固执地沉默着”。王安忆本来想写的可能就是人际隔膜，“人与人中间的墙是一定要消除的，应该有交流”，^①但无意中却涉及到了一种关于阶级/阶层的表述，这种阶级/阶层的表述后来频繁出现在王安忆的上海书写中，特别是她的“文革”回忆中。人们普遍认为王安忆写《长恨歌》是在怀旧，怀念旧上海。其实不然，正如张旭东指出的，王安忆怀旧不错，但不是那个旧上海，而是“文革”时期的上海，那正是王安忆的青少年时期，是一个人的最初身份的形成期。前面说过，王安忆一直羡慕的是能有一个民间形态意义上的上海人的身份，所以她要从小血缘、家族神话的虚构中获得自身地域身份的确证，但是作为“同志”的后代，典型的革命者的后代，一个革命之子，她是无法完全背叛自己的这种阶级身份的，更何况，从一开始，革命者母亲就阻止了她向那个旧的民间形态的上海靠拢的愿望，母亲一直小心翼翼地维护她革命接班人的身份。她无法逾越这一身份的壁垒。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出现，打破了这种阶级/阶层之间的对立和隔绝，王安忆，这个革命之子，既可以观望那个她一直心存好奇和羡慕的阶级/阶层，又可观望那个她有些可怜的城市贫民和工人家庭的阶层。当然，王安忆本人是这两个阶层之外的政治上的特权阶层，这种身份，影响到王安忆小说的叙述结构、叙事情感和叙述视角。

1. 上流阶层的一种表述。他们是企业主、买办、银行家、公司董事等组成的上流阶级，住花园洋房，出入舞场和各种交际场所，这是一个外人无法想象的上流社会，在《长恨歌》中蒋丽莉家的客厅和各种聚会中、在《好婆与李同志》中好婆对曾家昔日繁华场面的回忆中显山露水，那是一个城市的外来者、一个占领者对昔日那个奢靡、繁华的旧上海风情的想象。但王安忆显然是不熟悉这个阶级的生活的，她只是一个旁观者，而且，她之所以可以窥见他们生活的一角，还是由于“文革”的出现，打破了阶级之间的隔绝。王安忆对他们的讲述往往是通过一个比自己身份更低的人来实现的，不是一个革命之子对资产阶级的窥视，而是一个城市贫民或者工人家庭出身的人对他们的窥视。《富萍》本来写的是乡下姑娘进城扎根安家的事，是关于底层的一次叙述，但王安忆不自觉地通过保姆奶奶、出身贫苦几近孤儿的陶雪萍的视线又把我们带到了公寓和洋楼。“上下班有汽车接送”，神气俨然，从不与帮佣的“奶奶”说话，也不同她一桌吃饭。陶雪萍“走在大理石的楼梯上，听得见自己的脚步从高大的穹顶上碰回来的声音，有一股森严的空气笼罩了她”。当这家的主人回来时，“戴一副金丝边的眼镜……从她身边走过去，看都没看她一眼。陶雪萍不由便瑟缩起来”。王安忆通过城市底层的视线，来展示资产阶级的冷漠和威严，也通过一个类似自己/革命之子的叙述者的视角来展示资产阶级生活的优雅和趣味。那是百足之虫，是瘦死的骆驼，是半老的徐娘。《流逝》中前资本家的儿媳欧阳

^① 王安忆：《感受·理解·表达》，《上海文学》1982年第8期。

端丽能在严酷的生活下细品一杯豆浆来“偷得浮生半日闲”，《“文革”轶事》中张思叶一家虽然经历了政治的颠沛流离，但是他们身上依然保留了他们那个阶层所拥有的良好的气质和后天的修养。工人家庭的赵志国的震惊其实就是王安忆本人的震惊：

他只一眼，便从张思叶家那些身穿蓝布衫、梳着齐耳短发的女人们身上看到了超凡出众的气质。这是一种养尊处优的气质，虽然经历了这些年的颠沛流离，却依然存在，只不过是如受惊的鸟雀，藏进了深处。他从她们的短发上看出“柏林情话”式的端倪，还从中式罩衫上看出复古的摩登。她们无论年长年幼，都含有一种贵妇的仪态……她们长的各有差异，可是细部却一律经得起推敲。牙齿甚齐，皮肤细腻，指甲润泽，表现出后天的精致调养。

叙述的视角是从工人家庭出身因为“文革”政治的因缘际会与张家联姻的赵志国出发的，赵志国在张家的小心翼翼，他对张家的看法，其实是代表了王安忆的。不过，这时呈现在王安忆面前的这个上流阶级已然失去了旧日的好时光，开始落寞和落魄，家产被抄，亲人被遣，政治灾难接踵而来。对他们的遭遇，王安忆是黯然的，“但真看到这些趾高气扬的男女们赤着足，狼狈地在街上疾走，心里竟也是黯然的，好像临头的不仅是他们的末日，也是自己的”。王安忆痛惜的其实不是他们，而是他们代表的精致优雅的生活时尚和生活趣味。

上流阶级制造时尚，但这个上流在变革的社会面前正渐行渐远，而且，他们于王安忆本身，几乎是隔膜的。于是，在她的笔下，他们也只能是些雾中景，水中花，浮光掠影罢了。就像张家的那些大小姐们，再是有着良好的修养和气质，在赵志国看来，只能是些木胎美人，没有生命力，他不知道她们在想什么，也无法和她们真正沟通。虽然通过婚姻的形式，他进入了张家，但实际上，他永远无法进入她们的心灵。他不爱张思叶，也不爱张思蕊，倒是张家的儿媳妇——跟他出身类似的胡迪菁能跟他惺惺相惜，可是为了一间房子，却遭到了背叛。《“文革”轶事》虽发生在上流阶层的花园洋房里，但叙述却落在出身工人和弄堂的赵志国和胡迪菁的身上，通过他们的眼睛来看那个阶层。因此，“王安忆揭示的不是上流阶级生活方式本身，而是这种方式如何自上而下渗透、衰减、定型为每个城市人眼前与心中的生活图式的”。^①

2. 中等偏下阶层的表述。他们是《好婆和李同志》中的好婆一家，是《“文革”轶事》中的赵志国，是《逐鹿中街》的陈传青，是《长恨歌》中的王琦瑶、程先生。这个阶层在王安忆看来代表了城市生活的主流。他们可能是工人，也可能是职员，他们一般有这样一种思想，那就是：“政治上依靠共产党，生活上则向中产阶级靠拢，很

^① 汪政、晓华：《论王安忆》，《钟山》2000年第4期。

中间路线,也很小康。”^①他们无一例外都是生活上精打细算、克勤克俭、兢兢业业,对生活本身有着本能的热爱,一日三餐、柴米油盐是日常生活的艺术。他们又都是追求时尚的人,不是制造,而是追随,是城市时尚生活的体现者。他们是些没有个性的人,从来没有反抗之心,小心翼翼地维护现有的秩序和生活,在秩序之内顽强坚韧地一点点拓展自己的领地;他们是些聪明的人,个个都洞明世事、人情练达,那是生活的经验;他们又都是物质主义者,本能地把不利于生活的感伤情感排除出去。对上流阶层,他们心底羡慕,因为自尊倒也能很好地遮掩住这种感情;对下层和外来者,他们鄙夷和嘲弄,但并不过火。一切的社会秩序、伦理规则他们是无比精通,他们是社会平稳前行的基础,城市的芯子就是他们。他们住的弄堂就是这城市的景观,“是这城市背景一样的东西”。“上海的弄堂是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它们有时候是那样,有时候是这样,莫衷一是的模样。其实它们是万变不离其宗,形变神不变的,它们是倒过来倒过去,最终说的还是那一桩事,千人千面,又万众一心的。”

弄堂在王安忆笔下是一种象征,它“是城市的财富,是城市潜在的支配力量,是城市相对稳定的一面”。^②它是王安忆关于现代生活的想象图景,一种小康的、富足的、慵懒的又是节俭和细水长流的日常世俗。这决定了王安忆的审美趣味,物质化、注重细节、稳定、不抗争等特点。她开始成为平庸的中产阶级的代理人,革命之子的身份沉潜到深处,成为一种无意识,只在关于底层的表述和同志的表述中显露端倪。

3. 底层的表述。早在80年代初期,王安忆在回忆《墙基》的写作时这样写到:

我的家曾经在《墙基》中那样的一条弄堂里,隔壁弄堂的孩子家庭比较贫穷,常常跑到我们弄堂里来踢球。他们很野,会骂下流话,我们称他们“野小鬼”,很怕他们。听大人说,我们以前是分开的,后来大炼钢铁时把墙拆掉了,果然,两条弄堂间残留着一道墙基。记得小时候,有一天家里没有人,我躺在床上睡午觉,外边有一些小鬼在踢球,把球踢到我的院子里了。一个小男孩爬进来拾球,他从窗户里看到我的家里没有大人,就推门进来,我吓得大叫起来,觉得进来强盗了。可他一进来就看我的小人书,他说:“你们家有那么多小人书,让我看看,让我看看。”我还是叫着。他说:“你不要叫了,我看完这本就走。”可他看了一本又一本,没完没了,我拼命地叫,楼下隔壁的人以为我要被杀死了,都跑来,把他轰了回去。现在长大了,回头看看,他也很可怜,不就是要看两本小书吗?^③

这是王安忆对城市底层的最初感受,他们“贫穷”、“很野”、“会骂下流话”,对他

① 王安忆:《逐鹿中街》,《王安忆自选集之三》,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第78页。

② 汪政、晓华:《论王安忆》,《钟山》2000年第4期。

③ 王安忆:《感受·理解·表达》,《上海文学》1982年第8期。

们怀有恐惧心理。不过时过境迁,当王安忆长大成人后却觉出了底层的可怜,那么渺小的愿望,竟然也遭到了挫折。但是,在以后关于底层的叙述中,王安忆却很好地遮掩了对他们的可怜,而是挖掘底层生活本身的逻辑规则和生命尊严,卑微的愿望也变得庄严神圣起来。早期《庸常之辈》中的女孩子,她生活的全部目标就是找一个称心如意的爱人,然后办一场体体面面的婚事。《富萍》中的富萍的全部愿望就是不再回到乡下,能在城市里扎根。王安忆笔下的底层形象并不很多,而且,与对中下层的叙述类似,王安忆把笔触主要集中在他们生活的态度上,认真踏实,勤劳务实,可以想见不久的将来,他们也会加入到王安忆的中等偏下的阶层中去。

4. “同志”。除了底层以外,王安忆也涉及过自身的阶层——“同志”,他们是革命者,说普通话,家里有保姆/阿姨,但能同桌吃饭,住公家的房子,用公家的家具。他们在这个城市里有着微妙的双重身份:一方面是政治上的特权阶层,是城市的占领者和改造者,处于强势话语的位置,原来的上海市民在他们眼里是“老百姓”,而“老百姓”跟他们是不同的;另一方面他们也是城市的外来者,是市民日常生活的被改造者。他们互相改造,也互相被改造,他们之间的复杂关系在《好婆与李同志》中有精彩的描述。

王安忆的城市文化、城市面貌往往是通过阶级/阶层的分野呈现出来的。虽然新社会致力于消除阶级的存在,但实际上阶级/阶层的分化依然存在。只不过是“文革”打破了日常的秩序,使阶级/阶层的流动通过婚姻的形式成为可能。王安忆城市书写的独特之处在于她能够“探测为日常生活常规所掩盖的阶级结构和阶级特权”,“正是这些东西使得上海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再现成为可能,尽管这种再现只有在毛泽东时代之后的文学机制中才具有明晰性。阶级,精确地讲,它的压制(隐瞒)、曲解、记忆和恢复,成为看不见的城市用来揭示自己的内部风景。阶级阵线的交叉,不同阶级成员位置的交换,都被表现为一种混沌状态。这种混沌使一种想象的秩序,一种世俗的乌托邦变得栩栩如生。”“当阶级被作为王安忆的上海讽刺系列的切入点,阶级分析就成为一种文学视角。这种视角揭开由记忆和怀旧产生的这个城市多情的外表。”^①城市多情的外表下是坚硬的阶级/阶层的内核,而不同文化之间的较量和冲突也是阶级间的较量和冲突的表现。好婆和李同志如此,赵志国和张家也是如此。赵志国第一次见张家的女人们时,王安忆这样写道:

他面对满屋子的大小女人,脸上保持镇静,心里却忐忑不安。他觉得就好像面对了一个阵营似的,这真是一场阶级斗争啊!想到这里,他一贯的调侃的笑容便浮上了嘴角。^②

甚至在演绎陈传青与古子铭间的性别较量时,王安忆也不忘把他们分属两个

① 张旭东:《现代性的寓言:王安忆与上海怀旧》,《中国学术》2000年第3期。

② 王安忆:《“文革”轶事》,《小说界》1993年第5期。

不同的阶级阵营。其实，王安忆的阶级视角以及阶级意识在1981年的《墙基》中就有了全部的雏形，以后不过是对它的扩充和丰富。但是，切不可以为王安忆是个激进的革命者，王安忆一方面揭示出阶级/阶层的存在，另一方面却又不自觉地固化了这种分离，在王安忆看来“这种秩序比中国社会主义试图建立的秩序要古老、经久、普遍。它也更具有世界范围内的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与它相比，革命只是一种暂时的无序状态”。而且即使在这种无序的状态中，阶级/阶层的分离暂时被婚姻打破，但实际上，这种阶级/阶层所代表的文化内涵和心理秩序并没有根本改变。王安忆揭示的目的不在改变，而是承认并接受它。表现在小说中，就是对“本分”的强调。

那两个小妹妹都有些呆，做梦人的表情。这是年轻，单纯，生活在小天地里，从来不曾接受过外人馈赠的小姐。所以，对自己得不着的东西想也不敢想的。这就是本分。别看这城市流光溢彩，繁华似锦，可那千家万户的宝贝女儿，都是这样的本分人。其实是摩登世界磨炼出来的，晓得哪些是自己的，哪些是人家的，不能有半点逾越，这才能神色泰然地看这世界无穷变幻的橱窗。^①

到底是自知没有骄人的青春，很识相知趣，一点不放纵任性。

这种本分是对阶层标志和世俗规范的固守，是对现实秩序和规则的认同。一旦人逾越了这种身份之内的本分，厄运就会到来。就像《妙妙》中的妙妙所领悟到的：我算看明白了，在咱中国，要想做出点出格的事，就得把自己毁了。《好婆与李同志》中好婆也把李同志政治上的出事归结为做人的不本分上。这样，王安忆最终确立的是一种现世安稳的中产阶级写作模式，它与沉默的大多数无关，与那同样沉默的极少数也无多大的关联，它以一种哀伤和不自觉的嘲弄向往和追逐着资产阶级的时尚和趣味，这就是混沌的上海。

二、性别政治与文化地理

正像前面所论述的那样，我从来不认为王安忆及其作品是边缘，王安忆是世俗中人，入世极深，这在其作品中可以得到认证，她本人亦是承认对世俗生活的热爱，这也是她承认的与张爱玲的相似之处。不同的是，王安忆亦是政治中人，作为革命之女，王安忆是深谙政治之道的，插队时是先进分子，后来是上海作协主席，今又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2004年被选为“中国十大女杰”，她是最懂得规矩和秩序的人。王安忆也是文学中的主流人，虽然她以边缘自居。她不是文学的弄潮儿，但却是潮流之后的拾贝人，每波思潮都少不了她。主流中人的身份使王安忆成为性别

^① 王安忆：《新加坡人》，《收获》2002年第4期。

研究的一个典型个案,一个代表,由王安忆的性别关系建构和性别话语的建构,我们正好可以考察中国当代社会性别话语的演绎以及这种演绎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关系。

(一) 女性故事:女性主义与王安忆的小说叙事

从性别角度研究王安忆的女性主义批评者都面临这样的尴尬:一方面,王安忆的大量文本被看成是女性主义批评的经典文本,比如“三恋”、《弟兄们》、《叔叔的故事》、《纪实与虚构》、《长恨歌》、《富萍》、《桃之夭夭》等;另一方面,女性主义批评者又很难指认王安忆的性别立场,一个女性作者可以表明自己的性别立场,也可以不表明自己的性别立场,但是如果她屡次否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而批评者却非要从女性主义的立场来解读她,并把她的文本奉为女性主义的经典文本,这之间就存在着指认的尴尬与断裂。女性主义批评者和王安忆都试图弥合这种尴尬和断裂。一些论者认为是王对女性主义的曲解或无知,这是一种简单和粗暴的弥合;也有的论者认为这中间有着复杂的原因,她们是先行者,是孤独的,否定很可能是一种克里斯蒂瓦式的幽默,是一种解构男性中心文化的策略,因此,最有可能的是,在对来自西方的女性主义的认识上,是考虑到了中国的国情,考虑到中国特色,考虑到了自己的中国立场。^①这种弥合考虑到了各种因素,但也还是从作家角度出发,而没有考虑到女性主义本身的复杂多解以及女性主义本身的动态结构。在他们那里,女性主义都是一种即在的存在,却没有考虑到女性主义本身的分离的二重性:它已经发生了,但同时又在不断产生,它本身就存在一种间隙和分离。作家有时就处于这种间隙和分离中,而且,不管是作家话语还是文本话语,或者女性主义批评话语,都是由当时的文学话语、文化话语、社会意识形态话语的框架所构成,因此,它们不可能是已经形成的静态的不变量,而是复杂的动态的关系网络中不断调整的变化量。这样,我们就不仅应该考察作者话语、文本话语、女性主义批评话语是什么,表现出什么样的风貌,而且要考察它们为什么这样表述。具体到论文中的王安忆与性别就将是:王安忆本人的性别立场是什么样的?她如何定位自身?这种定位对其文本有无影响,影响怎样?她文本中如何建构性别?这种性别的建构与性别观之间的复杂动态关系如何?王的性别话语陈述与文本性别想象与整个社会的性别话语制造或者现代性想象之间的关系怎样?等等。

王安忆本人呢?尽管她并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性别立场,但是在众多的散文随笔访谈中,她又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停地言说着她对性别的看法,她的性别想象图景。2001年的《我是女性主义者吗?》是王安忆关于性别话题的一个集中表述,问自己,也是问他人。在此以前,1989年,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刚传入中国不久,中国的女性主义方兴未艾之时,台湾的女性主义者李昂和王安忆有《关于妇女问题与

^① 任一鸣:《解构与建构——中国女性主义文学与美学衍论》,九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144页。

妇女文学的对话》，在对话中，王安忆响应当时知识分子中让女人回家的潮流，也希望女性回归自然，回到家庭操持家务，因为中国的女性太累了，要做家庭和工作两份事情。此文在女性主义者中间引起哗然。后来，有《问女何所爱》、《男女关系的乌托邦》、《女性的脸》、《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女作家的自我》、《寻找苏青》、《上海女人》、《物质世界》、《我们家的男子汉》、《那个人就是我》等等，它们或直接或间接地透露出王安忆对两性关系的想象以及性别与她的写作之间的关系。下面我将以对话《我是女性主义者吗？》、书评《那个人就是我》为案例，来看王安忆如何表述自己的性别立场，如何想象性别。这其中不无矛盾之处，加之王安忆表达的隐晦，我的分析就多了些推理揣测的成分。好在王安忆本人也爱在真实材料的基础上虚构真实，所以我的推理也许正好歪打正着。

《我是女性主义者吗？》是一篇对话，由王安忆整理后发表于《钟山》2001年第5期。后每及人们问其性别观时，王总回答：请看《我是女性主义者吗？》。但王安忆是不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呢？对话其实并没有一个结果，王安忆不能明确回答，我现在也不能明确回答，尽管对话的另一方刘金冬，一个女性主义批评者，一个潜意识中以女性主义自居的学者，在对话的结束委婉地表达出王安忆是一个非女性主义者：“我们这部女性对话丛书中不是说有自觉女性意识或者没有，我们是看你的作品，作品里反映了什么。”王安忆的不明确、我的不明确与刘金冬的委婉，潜意识里都包含着这样一种认识：那就是王安忆不是一个我们一般意义上理解的女性主义者，也不是一个我们一般意义上理解的反/非女性主义者。这里面存在的认识上的暧昧模糊与断裂间隙正可以让我们重新思考关于女性主义的常识。

“我确实很少单单从女性的角度去考虑东西，好像并不是想在里面解决一个女性的问题，我没有这样想。”（女性主义是单从女性的角度考虑问题，解决的是女性的问题。）

“其实我写的这个男性还是很好的。所以你说我是偏向女性主义的，我就不能同意了。”（女性主义者笔下的男性是不好的。）

“我和张洁不一样，我对男性没有那么多仇恨。”（女性主义仇恨男性）。

“一谈到女性问题，我的头脑就乱了。我们对女性主义的观点是从西方接受过来的，和我们真正的女性现实不一定符合，我们的女性问题比他们残酷得多。我们的生产力那么落后，女性地位当然很低了。”（西方女性主义不一定符合中国国情。）

“我不太喜欢从性别角度看问题，这样会带来很多麻烦。其实人性中有些东西好，有些东西坏，有些东西深刻，有些东西浅薄，就这么简单。”（不喜欢从性别角度看问题，因为会带来很多麻烦，什么麻烦？写作上的还是意识形态上的，还是现实生活中的？跟上文“一谈到女性问题，头脑